

爱在高原 无怨无悔

——记青海省委党校（行政学院）关桂霞教授



关桂霞，满族，青海省委党校（行政学院）、青海社会主义学院民族宗教教学教研部主任、二级教授，民族学学科带头人。主要从事民族问题理论与政策方面教学与研究。先后荣获全国“巾帼建功标兵”“青海省优秀专家”“青海省先进工作者”称号。2009年9月被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领导小组聘请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学科评审组专家”。兼任中国民族理论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常务理事、青海省政协委员等。

□ 马明忠

一次选择 一生“钟情”

1977年7月关桂霞高中毕业，恰逢国家恢复高考制度。1978年3月，关桂霞从海北州的一个小农场到青海民族学院（现为青海民族大学）政教系读书，成为共和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七七级”。大学毕业后被选入青海省委党校工作，这一干就是近40年。这期间，也曾有选择离开青海的机会，也曾有提前退休的举动，但最终都未成行。关桂霞作为校院学科带头人，教学工作中，责任心强，任劳任怨。在完成单位繁重的教学任务的同时，每年还承担了大量为社会宣讲党和国家民族宗教理论与政策的工作，收到良好的社会效益。在青海省委党校建校60周年时被授予突出贡献奖。2020年，关桂霞就要退休了，又恰逢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一个党校教师的人生与一个国家的命运是如此的息息相关，看似偶然，实则必然。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命运融入国家复兴的历史洪流，才不会成为历史的旁观者；一个人，热爱这个国家的最好体现就是做好每一件平凡的事，干好本职工作，而非要有什么“惊天之举”。

学思践悟 文章相伴

在党校工作中，关桂霞强烈意识到自身知识和能力的局限性。在组织的关心、支持下，多次外出进修培训学习。其中，1985年9月到1987年1月，在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理论助教班的学习，使她

系统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民族宗教理论和中国共产党民族宗教政策的学习教育，这为日后的教学和科研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关桂霞看来，学习是超越自我、完善自我的过程。但学习不是简单的复制，学习的灵魂是创新，是提升自己思考问题、研究问题的过程。所以，多年来关桂霞十分注重把所思所想记录下来，围绕从事的专业撰写并发表了不少文章，其中不少研究成果得到了学界或同行的认可。1990年《论现阶段我国民族问题的特点》发表后，被中国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少数民族》头版头条全文转载。1998年，关桂霞撰写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民族问题理论的新发展》入选由中宣部等七部委主办的“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颁奖。关桂霞认为，以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主体的民族政策，有力地推动了民族地区的发展。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理论和实践，既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民族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同时也为多民族社会主义国家解决民族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20年后，关桂霞撰写的《改革开放四十年青海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实践及启示》，作为青海省唯一入选论文，参加由中宣部等九部委在北京主办的“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周年理论研讨会”。关桂霞提出，在我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状况，不仅是一个国家政治稳定的前提、国家统一的基础，也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保障，是考量执政党智慧及能力水平的一把重要标尺。所以，我们要通过民族团结教育建构政治共识，让生活在这个社会的每个个体，能够理性观察和处理民族

关系，能够对不同文化、不同习惯、不同宗教给予相互理解和尊重，以一种平等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彼此的“异质”行为，保持文化发展上的“和而不同、卓尔不群”。让“团结”成为多民族大家庭群体性的文化意识，并作为政治共识的基础在全社会传承发展。要创新民族宗教事务治理体系，在法治框架下，按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处理民族宗教事务领域的矛盾或问题。只有将依法治理的主体融合在彼此信任的基础上，社会共识与民间合作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潜心基层 咨政建言

党校教师，不仅承担着大量教学任务、科研工作，还是国家新型智库建设的生力军。青海省委党校提出建设“一流红色学府、新型高端智库”的目标。关桂霞作为一名老教师，身体力行，带领团队利用教学空隙、节假日，深入青海基层特别是自然条件恶劣的高寒牧业区，围绕民族宗教领域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藏区社会稳定社会发展等开展专题调研，认真倾听基层干部和农牧民的声音，形成了一批具有一定影响的研究报告，先后在内参刊发研究报告30多篇，其中10多篇受到省委主要领导批示。除此之外，关桂霞带着她的团队，每年都要承担完成青海省委省政府委托课题，直接服务于党委政府的决策



长江经济带城市转型发展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 仇 怡

长江这条古老的母亲河，拥有完整开放的生态系统，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重要支撑，她以水为纽带，承上启下，承东启西，流域覆盖11个省市区，人口和GDP分别占到全国的40%，既是国家发展的“经济脊梁”，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绿色脊梁”。但在实践中，依然存在很多问题，长江经济带城市转型发展，必须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树立全局发展观念，摒弃急功近利心态，找到保护与利用的平衡点，变粗放利用为集约利用、变低效利用为高效利用，才能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相得益彰、美美与共。

保护与发展不是零和博弈，核心在于尊重规律。尊重自然规律、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实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路子找对了，绿水青山就可以变成金山银山。总的来讲，要坚持调适理念、破立并举。一是调发展理念、调发展方式。不充分的发展与粗放的开发方式带来很多副作用，这是沿长江开发所面临的历史困境，也是需要长期面对的客观现实。推动沿江城市绿色转型，就是要精心调适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既要彻底摒弃“重开发，轻保护”的错误倾向，更要加快形成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空间格局；既要扛得住转型期的阵痛，又要经得起转型期的反

复，真正做到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必须清楚，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辩证统一的；共抓大保护非但没有影响经济发展，而且能推动沿江经济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二是破无效供给、破低端产能。长江沿岸长期积累的传统产能体量较大、动能疲软，严重挤压高质量发展空间。对沿江产业存量，要区别对待，可以“切一刀”，但不能“一刀切”，对于环保问题重、经济效益差的项目，要做好减法，坚决予以腾退，为绿色发展腾出空间。对于产业增量，要保持“蹄疾步稳”定力，对水资源开发、港口岸线利用和一些重大投资项目，要周密研判、科学决策，绝不能无序发展、降格以求。三要立高质量产业、立高质量链条。新产业、先进动能是沿江高质量发展的基石。对符合产业政策、符合绿色要求、具有发展潜力的项目，要实行资源聚焦、重点扶持、配套发展，不断延长产业链、价值链、利益链，以产业“含绿量”提升沿江开发的“含金量”。

区域与条块不能单打独斗，重点在于协作联动。目前，长江流域管理机制上还存在协商制度不健全、信息共享不充分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协同保护的成效，务必改变这种状态，实现协作联动。一是规划“一盘棋”。针对长江经济带整体性、关联

性等特点，强化全局观念，统筹各地改革发展、各项区际政策、各领域建设、各种资源要素，实现错位发展、协调发展。二是治理“一体化”。针对流域污染的扩散性、复杂性等特点，建立更高层面的协调机制，构建多元共治的现代流域治理体系，最终形成区域之间、政府部门间权责关系明确、信息共享顺畅、行动有机联系、纠纷迅速解决的一体化治理格局。三是执法“一把尺”。要充分考虑资本逐利性，针对长江上下游乃至沿海及其他流域的污染防治，明确统一的执法标准，防止出现污染的梯度转移。

治理与修复不会一蹴而就，关键在于制度体系。近年来，面对持续刮起的环境保护风暴，少数地区迫于环保问责压力，存在急功近利、避难就易心态，一些虚假整改、表面整改、敷衍整改现象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必须清醒认识到，污染防治既是一场歼灭战、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只有建立强有力的制度体系、责任链条，保持战略定力、坚持“止血与疗伤”相结合，既着眼当前、解决突出风险隐患，又着眼长远、解决常态治理问题，如此，方能实现生态环境的彻底好转。一是全面落实责任。严格落实企业直接责任、党政主体责任、部门管理责任、群众参与责任、环保监督责任、司法制裁责任，通过构建衔接紧密、完整闭环的责任链

咨询需要。同时，作为省政协委员，关桂霞参政议政的最主要通道也是围绕调研了解到的基层需求、百姓困难、社情民意提交提案，并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有些被评为优秀提案。

关桂霞还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为抓手，咨政建言。2002年以来，相继主持研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3项，其中《西部大开发中民族关系发展态势研究》获青海省第七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二等奖；《民族发展进步与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以青海为个案》，结项等级优秀，获青海省第九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评选二等奖。2016年主持研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重点课题《青海藏族聚居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研究》，鉴定等级良好，关桂霞提出，长期以来，在谈论藏区的发展时，人们多聚焦在政治、经济和生态方面，对文化软实力的作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实践，尤其是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方面的差距。该课题力图通过对青海藏区公共文化产品的内涵与结构、政府服务供给的价值目标与体系模式等核心问题的研究，梳理和构建符合民族文化特点与农牧区实际的发展思路和实践路径，在研究特殊性中发现具有时代共性的问题，同时尊重个性差异，以期为青海藏区公共文化建设方面的理论研究和政府有关部门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关桂霞还为青海藏区公共文化建设提出了4点具体建议，一是青海藏区公共文化产品特质呈现为“四个交互”：公共性与地域性交互；公益性与政治性交互；均等性与民族性交互；基本性与特殊性交互。二是青海藏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多元化模式设想：政府主导下的“主体共治”型模式；市场主导下的“合作共治”型模式；民间主导下的“契约化共治”型模式。三是实施“文化生态功能区”投资政策：在文化产业发展方面，国家出台的一些约束性政策不搞“一刀切”，将藏区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纳入国家层面，从项目、资金、政策等方面给予倾斜和支持。四是青海藏区公共文化服务能力提升路径：畅通公共文化服务需求诉求渠道；构建藏区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共享机制；完善藏区公共文化服务绩效评估机制；因地制宜搭建公共文化服务载体。



寻找共识

一是加强情感认同，找到情感共鸣点，做到以情动人。

近几年，我参加了原国家行政学院赴墨西哥、阿尔及利亚等发展中国家高中级公务员培训工作。我体会，给外国公务员授课，只有找到情感共鸣点，做到以情动人，才能实现效果最大化。

比如，如果满足于抽象地向国外公务员介绍，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给他们列出一堆数据，他们对中国还是没有多少印象。或者，如果热心于介绍中国现在军事很强大，已经有了航空母舰，有很厉害的歼20等，他们也不会有太大兴趣。我在给国外公务员授课时，为了加深他们对中国的感性认识，经常举的一个例子是中国最重要的节庆——春节期间在中国城市里就业的农民工返乡的情况。每年春节都是中国人大迁徙时节。这种大迁徙的背后，反映了中国人对家的情感，对家乡的依恋，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执着。我以中国南方珠三角地区农民工春节期间从人贴人挤火车回家过年，到后来开摩托车结伴回家，再到现在，坐高铁、开车回家的变迁，反映了中国人的情感，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从这个案例中，国外公务员能感受到，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传统、很有人情味的国家，对中国发展变化有更多的直观认识。

第二个例子是讲传统文化资源可以帮助下层妇女脱贫。给他们介绍在企业支持、社会资助参与、政府助推下，中国少数民族族的传统刺绣——羌绣从普通的家庭传统手工，转变为时尚的刺绣产品。众多羌族妇女、藏族妇女、汉族妇女通过培训，成为绣娘。羌绣给不同民族的妇女带来了收入，改善了生活。这个案例对国外公务员也很有触动。

二是要寻找价值共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这些都是人类的共同价值。文化“走出去”就是要发掘和传播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电视连续剧《琅琊榜》《美猴王》等作品能够被国际社会所接受和喜爱，很重要的原因也是传达共同的价值。包含共同价值的文化产品才有可能得到广泛的关注。

中国元素国际化表达

一部文化产品要“走出去”光有共同情感、共同价值理念还不够，还要有恰当的艺术表达。古人讲“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去”，首先要有中国元素、中国内容，同时还要找到符合时代欣赏习惯的表达方式。这样的文化产品才有可能“走出去”。舞蹈《千手观音》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千手观音》其内涵是大慈大爱。其舞台表达方式又极具创意、现代感极强。为国际音乐界称道的谭盾交响曲《离骚》《凤雅颂》等，也是中国元素国际化表达的成功例子。蔡国强是中国在国外获得艺术奖最多的当代艺术家之一。他擅长以中国最传统的火药为元素，用高科技手段创造了一种现代装置艺术，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同样是中国元素国际化表达的成功例子。

好风凭借力

中国文化“走出去”，还要善于借用当地的资源，善用当地的人才。善用当地人才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重要途径。哈萨克斯坦有一名年轻人叫伊尔泰，他在中国学习了七年汉语，是一位青年汉学家。他在中国学习过程中，观看了“中国好声音”等电视综艺节目，看了电视连续剧《伪装者》等，很有触动。回国后，就

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文化价值

——关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几点思考

□ 祁述裕

把中国的一些电视节目翻译到了哈萨克斯坦。宁夏智慧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也是一例。该公司董事长是一名埃及汉学家。他和两名宁夏大学的中国老师共同创办了智慧宫文化传播公司，主打中文翻译。将中国文化介绍到阿拉伯世界，把阿拉伯文化介绍到中国来。2011年以来，该公司翻译的有关中华文化的书籍达200多种。现在中阿文的翻译书籍约70%是由该公司组织完成的。可见善于借力是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方式。

提高文化营销能力

以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政府行为多，免费送文化多。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文化市场的竞争，如何把文化“卖”出去，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文化“走出去”是国家战略，有许多是为了实现公益性目标，因此，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的“送文化”还是必要的。但多数情况下，“送文化”往往效率不高，针对性不强。如何利用市场机制，将文化“卖”出去，让当地人心甘情愿地去消费，是文化“走出去”需要研究的一个大问题。前几年，原国家行政学院办过几期高级外交官培训班。一些大使、文化参赞说，以前，经常有国内演艺团体赴国外送文化——搞演出活动。这些演艺团体希望中国在当地使馆人员帮助送票。这让当地中国使馆人员很头痛。因为使馆也不知道哪些人喜欢看演出，结果常常是票很难送出去。让中国驻国外使馆工作人员欣慰的是，现在以商业化的方式在国外开展演艺活动越来越多了，总体来说效果也更好。

文化“走出去”最重要的是人走出去

人是文化最重要、最基本、最鲜活的载体。姚明、成龙、李连杰等名人在国外的影响力要远远超过静态介绍中国情况的书籍。现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出国公务或旅游，也有更多的外国人到中国来公务或旅游。提高中国人的素质，提高中国人为举止的修养，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基础性工作。